

視覺·文本

## 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

周佩霞、馬傑偉

本期的〈視覺·文本〉，把視覺對話從香港、中國大陸擴展到台灣。受訪者朱全斌教授，多年前曾在台灣不同的電視機構及公司任職編導及製作人。朱教授獲取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媒體與傳播學博士學位後，出任公共電視副總經理，其後轉到教育界教授傳媒科目，近年則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創意課程。幾年前他重執導演筒，拍攝紀錄片《潤餅的閩南身世》、《聖與罪》等。去年成功申請台灣電影輔導金，現正籌備製作劇情電影。朱教授的個人經歷，跨越不同視覺文本創作，他每個時期的視覺或創作實踐，又與台灣社會的發展相互呼應。此文獨立來看，朱教授的分享反映不同視覺文本如電視、紀錄片、電影在台灣視覺文化生產場域中的位置及歷史軌跡；從更廣闊的層面來看，這一期〈視覺·文本〉對話，特別是創意教育在台灣社會作用的探討，立體地展示視覺文本於大中華不同社區中，在政治、經濟、文化氣候下的不同進程和社會意義。

---

周佩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視覺文化、創意產業及文化理論。電郵：[carolbeings@gmail.com](mailto:carolbeings@gmail.com)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兼本刊編輯。研究興趣：視覺民族誌、社會理論、文化認同。電郵：[ericma@cuhk.edu.hk](mailto:ericma@cuhk.edu.hk)

Text Image

## Visuality, Creativity and University: interviewing Professor Bing CHU

Carol CHOW

Kit Wai MA

---

### Abstract

Bing Chu, a professor of creativity and a veteran producer, talks about his engagements with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ndependent production, and university arts education in Taiwan. His career history echoes Taiwan's history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His experiences in university-level education concerning creativity and audio-visual productions shed light on the "visual turn" in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an expressive selfhood, Prof. Chu shares with us his vision of empowering teenagers by exploring subjectivity from within and resisting the functionality imposed upon us from outside. Prof. Chu suggests that the visual turns have to do with the visual generation placing more trust on visuality over verbal accounts in Taiwan where the two opposing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nipulating social discourses. Prof. Chu has been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experience their lives by visualizing their memories. When individuals can speak their hearts and minds freely, a more humanistic society will follow, says Prof. Chu.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ow, Carol, Ma, K. W. (2011). Visuality, Creativity and University: interviewing Professor Bing CHU.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193–204

---

Carol CHOW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 visual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theory.

Kit Wai MA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itor) *Communication & Society Journal*. Research interest: visual ethnography, social theories, cultural identity.

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

## 創作軌跡

問：請簡述個人的視覺創作經歷。

朱：80年代在美國碩士畢業後，回到台灣的中國電視公司當編導。我覺得在電視台工作應該很有趣，而且讓我可以社會教化方面作出貢獻。台灣在1988戒嚴，開展了台灣電視事業的黃金時代。那時電視台的製作，並不單以商業衡量。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創作，製作文化性節目，情況像香港的香港電台。起初我負責兒童節目，後來轉做益智性、知識性的遊戲節目。

其後我到私人製作公司，開始有機會做戲劇製作。戲劇屬於比較商業的文化產品，需要顧及市場。那時我們曾做靈異題材的戲劇，但那時台灣社會風氣仍然相當保守，政府對電視節目的管制亦相當嚴格，劇集都要經過審批才可播出。我們的靈異節目，被政府認為導人迷信。其實當時台灣的電視製作處境，跟中國大陸現在的狀況差不多。

做了幾年戲劇節目後，我轉做新聞製作，做了兩、三年後，92年決定離開電視圈，到英國唸博士。當時台灣的電視媒介已出現很大的變化，政治領域上已有黨外力量，即後來的民進黨。民進黨那時經已擁有多個地下電視台，雖然沒有製作，但有播出渠道，整個台灣傳媒生態變得不穩定。另一方面，電視頻道也越來越多，製作越來越商業化。

98年在英國完成博士後回到台灣，發現整個電視生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線電視業務迅速發展，台灣電視台的數目由原來的三間變成一百多間。但當市場沒有擴大時，電視台數目的增加只意味着製作費的縮減，結果出現大量的對談節目，就是幾個人說來說去，整個製作氛圍很差。

幸好那時台灣公共電視開播，我十分懷念英國公共電視廣播的理想模型，希望親身參與理想電視模型在台灣的實踐，於是到了公共電視當副總經理。然而，那時我每天面對的卻是政治鬥爭。對於台灣的執政和在野兩黨來說，公共電視不是提供理想電視節目的機構，而是政治資源；他們絞盡腦汁增取電視台的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源，我們就是在這種夾縫狀態下生存。我覺得在華人社會建立公共理念及公共社會的理想，還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台灣已經是相對比較民主的地方，但在實踐公共廣播服務時還是比較困難。直到現在，台灣的公共電視還是沒有脫離那時的狀態，它們仍然只是談生存而已，缺乏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公共電視台還是為非商業性的節目，提供了一個生存的空間。

我在公共電視台一年多後離開，到大學工作。在學術界幾年後，又覺得需要一些東西填補學術界不能提供的價值及生活內容。於是我開始創作，首先到學校的戲劇系導演一個音樂劇，然後我畫插畫，因為我太太是作家，她出書時鼓勵我畫，畫了後她也覺得很有意思。這些創作讓我可以平衡學院生活的不足。

在創作歷程上，最大的轉捩點是拍電影。拍電影是很多人的夢想，但它需要的資源很多，很難實現，所以我從紀錄片開始。五年前，我太太創辦的南村落舉辦了一個有關潤餅的活動，她需要一個紀錄片，於是給了我一點經費，我就完成了《潤餅的閩南身世》。潤餅是清明節用來祭祀祖先的食品，祭祀後大家拿來吃，有慎終追遠的意思。不要看台灣這麼小，從南到北，每一個地方吃潤餅的方式都不一樣，裏面的材料也不一樣，但每個地方都說自己是正宗的。我追溯不同地方的潤餅文化以及其根源，我首先到閩南，因為台灣大部份移民是來自福建，我就到福建南部泉州、海安、廈門等地方，結果發現台灣的吃法是沿自泉州的傳統，本來不少台灣居民就是來自泉州移民。

一年半前，我拍了台灣小說家陳映真的紀錄片，名叫《聖與罪》。陳映真的身份在台灣一直很尷尬，他是帶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左翼作家。國民黨時代，左翼作家並不討好，陳因為思想問題被關了七年。陳出獄後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但民進黨主張台獨，不喜歡陳映真的思想。結果陳在台灣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以前的台灣文藝青年都很尊敬陳映真，因為他的文學內容充滿人文關懷，對人性及價值的探討以至社會大議題有很深刻的描寫。我年青時亦被他啟發，但是現在的年青人不太理會文學的傳統，更不要說是閱讀文學，我拍這個紀錄片的原因，就是希望讓

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

年青人認識台灣的文學傳統，通過影片去親近好東西。

《聖與罪》是一部一百多分鐘的紀錄片，相等於一部電影的長度。因為陳映真的創作生涯有50年，他的作品反映了台灣50年的歷史，需要以這麼長的篇幅交代。

拍完紀錄片後，我的野心更大，希望拍劇情長片。於是我嘗試申請台灣電影輔導金。近年台灣電影產量不多，政府為了鼓勵電影製作，參考了其他如歐洲等地設立輔導金的制度。輔導金的用意不是提供全部資金，而是讓受資助者用它作為基礎籌集其他資金。我的計劃書成功獲批了500萬台幣資助。故事主題是描寫台南女性，如何面對及反抗父權架構。片名暫定《秋月》，但因跟香港羅卓瑤拍過的一部電影同名，所以可能會更改片名。假如能夠籌到更多資金，影片就必須要有商業考量，但若資金不足的話，就比較會着重它的藝術表現。

## 視覺在創作中的位置

問：視覺在你的創作中，位置是甚麼？

朱：視覺在現今社會的創作及溝通過程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因為大家身處在充滿視覺的環境裏，在這樣的訓練下，傳統、規矩的視覺呈現方式基本上經已不能吸引觀眾。21世紀是一個透過影像說故事的時代，我們的創作需要呈現這個氛圍的特殊性。譬如這一代年輕人是看MV（音樂錄像）長大，看的都是斷裂的、不連貫的影像，還有在真實跟虛擬混雜在一起的影像，它們建立了某種方式的影像溝通語言。同時，視覺語言的符號比較多元、混雜，容許更多元的閱讀、詮釋。

問：在《聖與罪》中，你如何以視覺元素豐富陳映真的生涯？

朱：《聖與罪》製作前，韓良露已經把劇本初稿寫好。許多旁述以及小說文本的重現，我必須從視覺化的角度構想，性質上接近編纂式紀錄片（Documentary Chronicle），不同於現在很多紀錄片流行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之蹲點跟拍手法。當我們拍攝《聖與罪》時，陳映真在北京，而且他中了風，不能講話，也不見人，跟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是行不通的。同時，影片透過陳映真的小說作為台灣50年的歷史回顧，一些資料性的東西有必要交代，但那些資料卻不一定有真實的畫面。所以，紀錄片除了用傳統的訪問交代陳映真的人生外，還以不同的動畫及再現形式貫穿整套影片。例如我用黑色電影(附圖一)、劇情片(附圖二及三)、甚至劇場的風格及表現形式(附圖四)，重現陳映真的創作。另外，我自己或請學生以手繪動畫(附圖五)、沙土動畫(附圖六)、水跟油彩的混合(附圖七)等不同方式，交代某部分的文本。這些畫面看起來很原始，不太專業，但我覺得這種樸實、非布爾喬亞的色彩，反而是我希望在這部影片中表達的美學，它同時符合陳映真對社會主義的追求與嚮往。因為我的資金很少，我的資源就是我的學生，我把本來是缺憾的東西，在美學上作調整、統合，讓它變成一種特色。

## 創意教育與社會

問：視覺創作在創意教育的課程中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

朱：首先，現在的創意教育要在跨媒體的教育中實踐。以前媒體教育的分類邊界分明，電影、電視、平面設計、出版、廣播等科目是分開來的。數碼化後，各媒體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我所任教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研究所，就是希望學生可以自由地用跨媒介進行創作，這裏沒有權威、不能動的東西，學生怎樣創作都可。因此，視覺並不是唯一的創作方式。

即使如此，視覺創作或拍片仍然是創意課程的核心部分。但是跨媒體的視覺創作跟電視不一樣。電視是建構社會的重要媒介，同時又因觀眾觀看電視的習慣，電視非常依賴對話。但我在教學時，發現學生比較喜歡用圖像表達自己以及對社會各種處境做詮釋，他們不太依賴對話。這種傾向在他們的紀錄片中非常明顯。以前紀錄片很多旁白，但現在學生們盡量避免，彷彿覺得畫外音對真實性會造成破壞。所以不管是聲音或影像，它們都盡量用原聲捕捉下來，不想自己附加。



我覺得台灣的學生越來越不相信語言，這可能跟台灣解嚴有關。你可以說台灣媒體很糟糕，但換個角度看，它卻解構了許多舊有的神話。以前台灣媒體是一個建立集體想像的機構，它告訴我們國家社會是如何的神聖。但台灣的兩黨政治完全顛覆了國家的集體想像，透過解嚴後的媒體亂像，大家看到的是台灣媒體的表象背後政客或公眾人物的計算及操控。因此，年青一代並不輕易相信大眾媒體，他們對真假十分敏感。同時，網絡的出現，亦改變了新一代的溝通方式，他們喜歡用手機或相機，不停的拍，以圖片代替語言。以前的溝通依賴說話，但主體的主控性在語言的溝通模式中較弱。數碼化、影像普及化以及網絡社會的形成讓大家享有更大的主控性。

問：影像雖然讓主體有更大的主控性，但是它會否窒礙對話的進行，影響溝通？

答：影像也可以促進對話。我在創意培養的課程中設計了很多遊戲，其中一個曼陀羅繪圖練習，學生被要求在畫紙上先畫一個圓，然後通過時間回流回到新生時的狀態，並回想那一刻睜開眼睛看到甚麼，就跟着把那個東西畫出來。那是生命剛開始跟地球接觸的一刻，那一瞬間，可能決定你這一輩子要學的議題是甚麼，這些東西可以用很抽象的圖表現。畫完後我請其他同學憑直覺講出每一幅畫的主題，以及猜猜作者是誰，結果大家都能夠猜中，可見人是很敏感的，雖然那些畫很抽象，但同學們總會找到畫與畫畫人之間的連繫。重點是找到主題，主題就是每個人在藝術上需要面對處理的生命議題，在認識或重新發現到自己的生命議題後，就好比找到了生命的目的。這不單可以幫助他們創作，當故事跟自己的生命議題有關時，學生會更熱情、更投入，因為這東西是他們真正關心的。

在紀錄片課堂上，我又鼓勵學生拍一部《關於我》的短片，發掘自己的內在。我叫他們回想自己小時候玩的遊戲，然後用自由書寫方式，不停的寫五至十分鐘。你會發現他們寫的東西充滿圖像，然後你讓他們把這個發展成劇本。我覺得所有創作都要從自己出發，所以創作不應以假想開始，而是先把自己的資料庫盤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清楚。這樣每個人做出來的都會不一樣，都會有個人的東西在其中。學生也會覺得這過程是一種自我整理，雖然他們也只是20多歲，沒有太多的人生經歷，但是他就不用怕自己做的東西會跟人家一樣，他就是他。

問：你在創意教育鼓勵學生們表現自己，那麼你會否鼓勵他們走前一步，參與或介入社會？

朱：我覺得每個人找到他們的特點，然後敢於表現他們的特質就已經很好了。至於他如何跟社會配合，是每個人不同的造化。我覺得你在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可以做一份長久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要先了解社會對你的要求是甚麼，然後把自己變成社會想要的東西。因為偽裝的生活不能夠長久，假如你每一次跟社會面對面時都要戴着面具便會很累。我不會催逼他們參與社會，我只是讓他們覺得表現自己是好的、快樂的，找到自己讓你可以不一樣，我認為這才是創意教育背後的價值，是這個東西。

問：我可以理解創意教育的進路是希望以個人政治解決現代性問題嗎？那麼你對一些強調公共政治參與的論調如何理解？

答：創意的本質是不應去設想它的功能性，創意過程中面臨的狀態有些是純藝術的性質，而純藝術是可以不管社會功能的。因此我認為創意教育不應該太着重功能性，其實我不太認同現在的大學教育，完全是為了把每個人培養給適合社會使用，每個人都變得十分功能性。但人作為人，應該尋找自己獨特的地方，這些特質讓他們可以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那不完全是符合社會功能的，我覺得人需要這東西來平衡，因為工作時你都是為別人而活，但你一定要有屬於自己的一塊天地，這樣你才能夠獲致一個生命的平衡。



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



圖一：《聖與罪》紀錄片中陳映真作品《夜霧》小說再現



圖二：《聖與罪》紀錄片中陳映真作品《將軍族》小說再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圖三：《聖與罪》中陳映真作品《我的弟弟康雄》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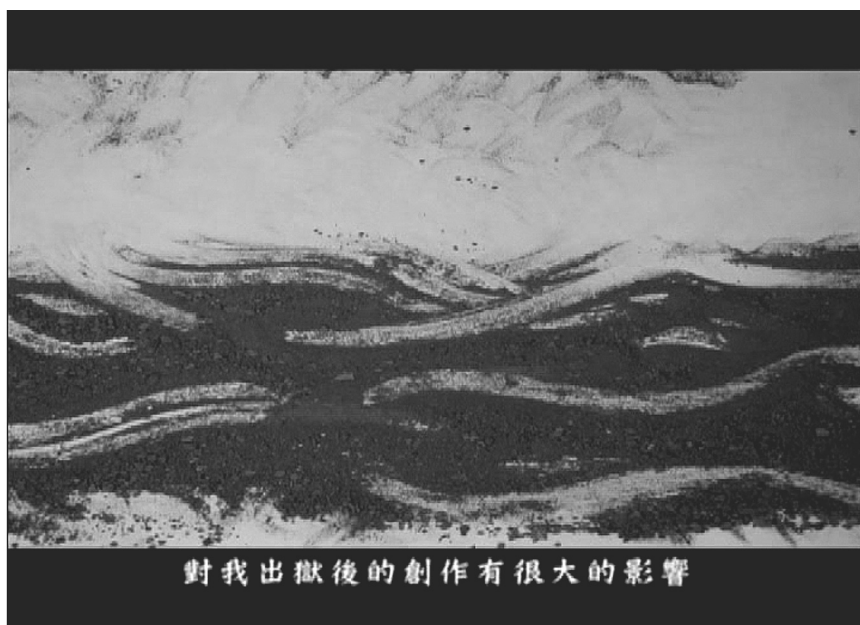


圖四：《聖與罪》陳映真作品《啊！蘇珊娜》小說再現

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



圖五：陳映真的《忠孝公園》在《聖》片中以手繪動畫方式呈現



圖六：《聖與罪》中的沙土動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圖七：《聖與罪》中的油彩影像

## 本文引用格式

周佩霞、馬傑偉(2011)。〈視覺、創意教育與台灣：朱全斌教授專訪〉。《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6期，頁193-204。